

天時地利 中心機遇

蘇主榮著 陳愛潔譯

經過四年在瑪利諾修院講課，六年在台灣山區傳教，十三年被委派從事發展及籌款工作——其中四年出任修會的聖召主任之後，筆者快要慶祝五十歲生辰之際，正懷疑自己尚有沒有機會繼續傳教和從事中國研究，機會突然出現，任澤民神父，即現任聖神研究中心策劃主任，突然鼓勵我來香港，當時正是一九七九年。任神父對我說：「中國正在開放，而你可以善用台灣學得的國語。你為什麼不與溫順天神父（現任《鼎》英文執行編輯）一起？溫神父將由台灣來協助湯漢神父（現任香港教區輔理

主教）和梁作祿神父，開辦一個研究中心。」我表示，只要能重新積極參與傳教工作，這對我來說是在甚麼地方都沒有什麼分別的。但我向他表明，我的國語程度非常有限。溫神父是我以前的學生，也是三位創辦人當中我唯一認識的。他和我在同一時間來到。

我們協助湯神父物色一處能容納五至六名傳教會士和幾個教友職員的地方。只有很少數物業看來能夠滿足我們的用途，於是，我們開始在各自的宿舍工作和聚會。這時候，我們開始每月的利瑪竇

研究小組，就我們知道的中國教會情況交換意見。

經歷變遷，但小組至今依然繼續。廿五年來，曾經出席聚會的參加者可能大概超過五百人，但是小組核心始終由中心成員組成。最後，胡振中主教（後來擢升為樞機）建議我們可使用香港仔聖神修院的其中一個樓層。這對我們太適合了。我們原先打算讓參與計劃的聖職人員以團體形式一起生活和工作，但很快放棄這個念頭，因為有越來越多團體有意讓一位或以上的成員與中心交往。

我們從沒有想像過中國教會的官方和非官方兩部份之間的分裂會擴散到香港，而我們這些研究員竟變成了香港教區一些保守的聖職人員、修會會士，以及教友心目中的不受歡迎人士。我們當然明白他們所關心的事，也沒有對他們的猜疑採取對抗的態度。我們著手做自己的工作，也接納人家的批評，肯定我們是做對的，就是充當中國教會分裂雙方之間的橋樑，以及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之間的橋樑。從起初，我們的主要目標是成為促進有關各方

之間和好的因素。很難確定我們的努力是否獲得成就，但我認為，現時不管在中國教會內外，大多數人都會看出我們是真心地嘗試推動和好的過程。我們對此感到高興。與此同時，有越來越多傳教修會會士視我們的中心為他們在外工作的地方。大部份人在使用我們的設備及材料，為自己的修會團體和國家取得資料之餘，也分擔中心的部份工作。

湯漢主教的其中一個很強的素質，就是歡迎很多人使用中心作為研究的基礎，又對於他們為促進中心的目標而做的一切表示感激，並給予他們完全的自由按自己的意願行事。有人為中心的刊物撰文，有人做翻譯工作，有人前往中國，探訪他們的團體昔日曾服務過的地區，看看可以怎樣協助現時在那裡工作的中國教會人員，有人純粹與修會團體分享他們旅遊和研究的成果。目前有六位傳教會神父和一位修女在中心辦公，大部份時間在那裡度過。五位教友組成全職支援隊伍，他們負責辦公室的運作，管理主要來自歐洲、亞洲和北美洲等國家

的捐款人所資助的多項計劃。中心現有的大多數人都與我們一起共事多年，合作愉快。我們很滿意中心的精神和方向，也很高興成爲它的一份子。香港

教區給我們機會一起工作，提供辦公室和圖書館等設施。這是一個理想的傳教事工，在理智上和精神上挑戰我們。很難找到更好的地點或位置，讓我們全面地探討和影響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之間的關係。

我認爲中心的成立正符合天時地利。香港的地位優越，確是往來中國的十字路。這裡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可以在友好的氣氛下公開討論，分享中國的消息。無數的訪問團和學習團在前往中國途中，都順便過訪中心，聽取有關中國教會和社會情況的簡介。最初，即使中心的職員亦只是隨旅行團去中國，但是，隨著中國越來越向遊客及學習團開放，連這些訪問團也可以自行進入中國，無須由中心職員陪同。其中不少訪問團在週遊中國、探訪當地的教會後，都會安排與中心職員會面，分享他們

的見聞，爲的是看看他們在訪問期間所得的印象是否正確。自從香港於九七年回歸中國之後，經此地去中國旅遊就更加容易。

至於中心的工作，則由安排成員訪問中國，看教會的更新，逐漸轉變爲以很多不同的方法來協助這同一的教會，包括提供短期導師，作爲海外教會團體資助國內部份教會項目的渠道。我們亦使中國教會能夠分享它的想法，邀請當地的學者爲我們的刊物撰稿。中心也爲一些優秀的教會人員申請獎學金，讓他們到海外升學。因此，香港及聖神研究中心已證實是促進中國與海外教會溝通的最有利地方。湯漢主教、溫天順神父和我本人，即中心四位創辦人的其中三人，仍從事中心的工作，至於第四位創辦人，即梁作祿神父，已在十年前獲宗座外方傳教會派到意大利工作。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及對中國的服務這方面工作，一直是振奮人心和令人愉快的經歷。我慶幸自己能夠成爲這經驗的一份子。我感到聖神研究中心和我本人都是符合天時地利。□